



# 1411年,东西之间的文明变量

尼尔·弗格森认为,文明是一个复合体系,在文明的发展、竞争中,各因素并非均衡。这是不能简单判断早期东西文明各自崛起,也是今日不能轻易根据变量因素,断定今天的西方文明、中国文明等一定走向强势或衰败的原因。

□书评人 郑渝川

同属从殖民地到独立的新兴共和国,美国和阿根廷在很长一段时期,都处在平行的轨道上。比美国略晚完成独立的阿根廷,政治上同样面临联邦和州的权力矛盾,经济上均向西部蛮荒草原推进疆界,还同时引进了大批欧洲移民,都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挤入了经济大国的行列。就在那个时候,主流的经济学家纷纷断言阿根廷再过100年(公元2000年),就将代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;而对美国,则没有这么良好的预期。

这个例子能够说明,参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、充沛的高素质海外移民、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因素组合在一起,并不足以决定国家竞争的成败。

## 文明与变量的关系

这就是文明的力量,一个宏大命题,一套开放的科学,但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。

金融史家尼尔·弗格森在《文明》一书中,将视角投向1411年。在这一年,中国的明王朝正在建设紫禁城,中国的运河和海洋贸易十分发达,江南的丝绸畅销整个亚洲。很显然,如果套用一些流行观点,是无从解释明王朝何以盛极而衰。同样,在当时,最善于使用火器,在数学、天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掌握领先地位的国家,不是欧洲,而是奥斯曼

帝国。随后几百年,急速崛起的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,还处于动荡混乱之中,丝毫没有军事和科技优势。

这就注定造成了文明史研究讨论中,最有争议的问题——是什么使得西欧为主体的西方文明在1411年后的数百年里后来居上?中华帝国、奥斯曼帝国等长期强盛繁荣的国度,缘何滑入了下行区间?

西方文明数百年优胜的事实,催生出版本各异的西方文明优胜论。这些优胜论的普遍特色,是从近现代发展崛起的经验中找出共同点,譬如商业发育、火器使用、自然科学成果、军事优势等等。问题就在于,这些所谓的共同点,不仅可以找出太多的史实反证,而且也可以找出,很多是发展优胜的结果而非成因。

## 弗格森的新解释

基于此,尼尔·弗格森重新提出了一套解释1411年以来西方文明优胜、并在二战后促成新兴国家(文明)复兴的发展兴衰规律,包括六点:

第一,竞争。欧洲国家中世纪及其后一段时期内,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分散,为主权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育提供了平台。欧洲人的自我分裂,不仅导致了他们被迫各自竞赛式的到遥远的地方寻求机遇,推动殖民扩张,而且国家、城市(城邦)之间也有激烈竞

争。数百年后,东亚、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再现了这样的竞争。

第二,科学。研究、理解并最终改造自然世界的方法,使西方文明具备了优于同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重重大军事优势。在1411年后的几百年内,奥斯曼帝国曾有许多机会在科学和军事应用领域,赶上欧洲分散的国家和城市,但专制体制和宗教教权断送了所有可能。反之,1662年、1666年,英国皇家学会、法国科学院相继成立,从欧洲各国吸纳精英人才,为科学发育突破宗教教权束缚,就大大拓展了所在国竞争优胜的空间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虽然是个专制君主,却同样注重包容宗教信仰、激励军事应用创新和基础科学发展。时至今日,科技水平基础上的军事实力,仍是决定一个国家崛起抑或衰落的重要原因。

第三,财产权。以法治作为保护私人业主,并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的方式,为最为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提供了基础。这项法则并非只适用于解释西欧和北美国家的崛起,巴西、印度、南非等近几十年来激崛起经济体,均受益于财产权原则;并因此使得种族等社会矛盾以和缓方式调试、纾解。

第四,医学。医学使西方社会及其殖民地逐次实现医疗卫生、人口预期寿命方面的重大提升。只有人民健康,才可能支撑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、大范围的城市化过渡。

第五,消费社会。生产、购买服装和其他消费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形成一种促进发展进步的生产和生活模式,带动了工业革命。如果没有市民消费

为依托和驱动,生产模式、技术本身的应用范围会极其狭窄,很难带动进一步的革新。近现代文明史上,资本主义制度的数次变革改良,在推动市民社会形成的同时,也致力于“制造”更多的消费者,并由此进一步巩固了市场体制。前苏东模式不能满足消费需求,无法与西方市场体制竞争,溃败落幕实属必然。相对应的是,在中国、土耳其等过去几百年里一度积贫积弱的国度,激活消费,借助消费社会和市场体制带动经济升级,恰恰是其重新发展崛起的真正奥秘所在。

第六,工作伦理。从基督新教及其他宗教、信仰发展而来的活动模式和道德框架,为上述五点所创建的存在潜在不稳的动态社会提供了黏合剂。中国改革开放后,整个民族掀起的持续工作热情,造就了中国发展契机,即便这种发展存在硬伤和隐患。尼尔·弗格森注意到,美国、日本、西欧一些国家近年来之所以陷入发展困境,很大程度上与国民工作伦理、工作热情的丧失有关。

按照尼尔·弗格森的观点,文明是一个复合体系,行走于有序和无序之间。在文明的发展、竞争中,各因素并非均衡发挥作用。文明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运转平稳,得以持续进行自我调节应变,也可能基于一个细微的、偶然的变动打破它的良性平衡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轻易根据变量因素,断定今天的西方文明、中国文明等一定走向强势或衰败的原因。不过,尼尔·弗格森在《文明》一书中表示,对西方文明解决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仍有信心,但同时提醒,西方文明此前已式微并没落过一次,他指的是古罗马帝国的覆灭。



《文明》  
作者:(英)尼尔·弗格森  
版本: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版  
定价:69.00元



《帝国》  
作者:(英)尼尔·弗格森  
版本: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版  
定价:68.00元

# 被改造的身体与精神

□书评人 李建斌

多年前,读过苏力的《送法下乡》。近来又读到胡宜的《送医下乡》,早年费孝通先生还曾写过一篇《文字下乡》。近代以降,文字、法律、医疗等诸事物纷纷“下乡”,络绎不绝。时至今日,仍有科技、文化、卫生等等各种下乡运动,此间意味,值得揣摩思忖。

以“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”为框架来重新检视近代以来的历次社会改造运动,可以发现,虽然各种改造运动的着力点不同,但大体是沿着德育、智育、体育三个层面推进的。胡宜的《送医下乡》即全面剖析了近代中国对身体的医治和改造历程。但作者并没有就医谈医,而是把对身体的医

治放在近代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中来透视。作者认为,疾病成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隐喻,饱受欺凌的中国被污名化为“东亚病夫”,于是医治疾病、强身健体不仅是对个人身体的关照,也成为实现国家富强的象征。

身体与政治之间的关联自古有之,只是到近代其内涵发生了巨变。严复论及甲午战争的败因时痛心指出,日本仅以寥寥数舰、区区数万人占我藩属朝鲜、灭我大清水师,民力何其羸弱不堪。严复因而提出,“鼓民力”为救国的当务之急。正如《送医下乡》一书所云,“疫病防控不仅是‘保护身体’,更发展成‘民族防卫’的政治抗争,加强卫生机构建设、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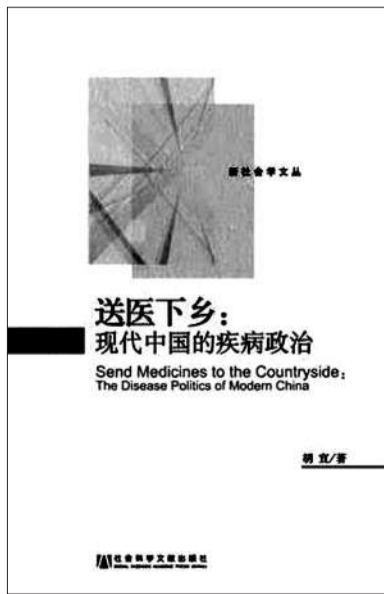
进民众健康、改进卫生习惯的呼声也日趋高潮——‘卫生’开始凸起。”

清朝末年,屡受列强欺凌,刺激了一些有志青年赴海外学医救国,力图以西方医学来救治中国人病弱的躯体。其中包括鲁迅和郭沫若,他们早年都认为中国要振兴须从医学着手。

这场下乡运动持续百余年,至今仍然没有消停,农民被改造、被治疗的地位并未根本性改变。送医下乡、送法下乡、送戏下乡等各种以国家为主体、以农民为改造对象的下乡运动虽然不再骤雨狂风,却是持续不断、绵延不绝。

《送医下乡》的作者对现代国家中“人民”的地位有很

深刻的反思,一方面“人民这一充满神圣而崇高感的名词从此成为中国社会政治、思想、文化等各领域具有绝对统摄性的政治话语”,另一方面,“再造国民”的任务并没有终结,群众需要被医治、被改造的病弱地位一如从前。当前针对民众“富了口袋,穷了脑袋”、“物质繁荣,精神空虚”的现状,又兴起了“文化建设”的热潮。但在这个礼崩乐坏、思想混乱、诸神征战的转型期,教化者应当到哪里去寻找医治社会疾病的药方呢?究竟是礼失而求诸于“野”,抑或求诸于“洋”、求诸于“古”?这正是《送医下乡》一书所内含的隐喻,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的时代问题。



《送医下乡: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》  
作者:胡宜  
版本: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版  
定价:35.00元